

天文化
遠見

The Roaring Nineties
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Prosperous Decade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史迪格里茲

史迪格里茲 (Joseph E. Stiglitz)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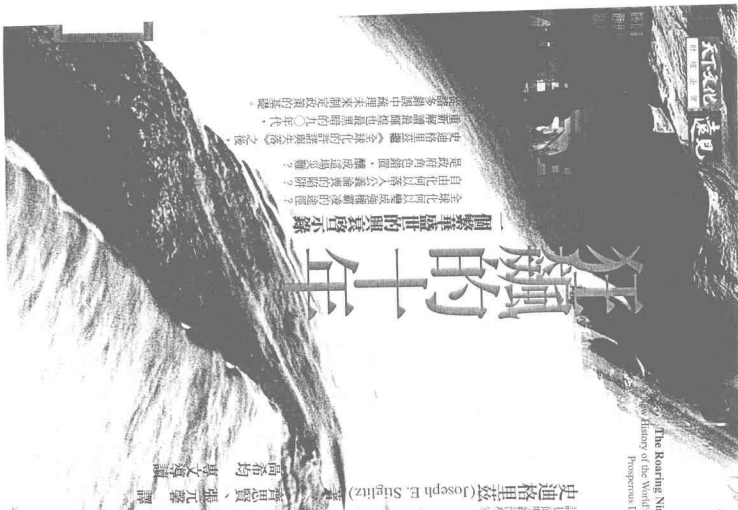
高布均
曹文導 譯

齊世賢、張元蓉
譯

狂瀾的十年

一個繁華盛世的興衰啓示錄

全球化何以變成種族衝突的經？
自由化何以帶入公義淪喪的時代？
是政府角色錯位，釀成經濟危機？
史迪格里茲繼《全球化的詛咒與失約》之後，
重新解讀最輝煌也最黑暗的人○年代，
從諸多錯謬中梳理未來制度改良的途徑。



當代中國出版品目錄(續)資料

狂瀾的十年——一個新中國興起的興衰啟示錄／Joseph E. Slaughter
第一版 臺北：允晨文化，2004（民93）
面：公份：一（4冊正裝）：C8932
譯名：The roaring decades
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prosperous decade
ISBN 986-417-606-6（平裝）
1. 經濟 2. 中國 3. 新中國的興衰——論議
553.85 940.02584

附錄內容

狂瀾的十年

一個新中國興起的興衰啟示錄

作者／Joseph E. Slaughter

譯者／許世瑩、張克智

原刊／時報

原刊編輯／陳自芳

封面設計／梁上芳

出版者／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創辦人／高希均、王力行

天下遠見文化事業群 總經銷／高希均

總發行人／許世瑩、張克智／王力行

天下文化出版事業群／林榮發

星傳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總經銷／吳俊宏

法律顧問／胡市止律師事務所陳長文律師

地址／台北市104松山路93巷1號2樓

電話／(02) 2662-0007

傳真／(02) 2662-0007

電子郵件／camps@wgs.com.tw

直接關係帳號／1326701-6號

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傳真／(02) 2662-0007

印刷廠／宏寶利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廠／宏寶利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星傳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台北市警察局警字第1001號

總發行所／宏寶利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4年12月12日第一版第一刷

定價／420元

原書名／The Roaring Nineties: 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Prosperous

Decade

By Joseph E. Slaughter

Copyright © 2003 by Joseph E. Slaughter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4 by Commonwealth Publishing Co., Ltd., a

member of Commonwealth Publishing Group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through Random 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86-417-606-6 (平裝)

定價／C8932

星傳國際／宏寶利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星傳國際／宏寶利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星傳國際／宏寶利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星傳國際／宏寶利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星傳國際／宏寶利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星傳國際／宏寶利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星傳國際／宏寶利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星傳國際／宏寶利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星傳國際／宏寶利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星傳國際／宏寶利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星傳國際／宏寶利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星傳國際／宏寶利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星傳國際／宏寶利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本書版權所有，未經許可，不得翻印、轉載、或作其他用途。

作者簡介

史迪格里茲 (Joseph E. Stiglitz)

1943 年生。1967 年於 MIT 取得經濟學碩士學位。2001 年以資訊不對稱市場的研究所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1993 年至 1997 年間擔任美國柯林頓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並曾出任該委員會主席；1997 年至 2000 年間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及資深副總裁。現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

除了卓越的學術成就與豐富的資歷，史迪格里茲最讓人敬佩的，便是他追求真理、直言敢言的精神。他身為美國政府官員，卻挺身批判美國農業補貼政策危害了它國農民的生計，他也力促美國政府在藥品專利上放寬智財權限制，為的是保障貧窮國家的醫療救濟。他入閣成為柯林頓政府幕僚，卻毫不留情地指出，柯林頓不惜犧牲社會福利等重大議題，而以削減赤字為施政要務，這是為了迎合野黨而做出的政治妥協，欺負了許多選民當初的託付。他位應世界銀行要職，卻直言國際貨幣基金成為美式資本主義的宣傳工具，並對它在因應全球金融危機時的僵化與麻木表示不以為然。

因為有此胸懷，字裡行間，他不但能展現出對人類經濟學者同儕的思辨能力，在往也揉合了知識份子經世治國的熱情，以及對社會均等正義的人道關懷。經濟議題攸關生活的各個面向，但是一般大眾對於經濟政策所知卻相當有限。繼《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之後，本書是史迪格里茲等試與一般讀者對話的第二本書類型。作者深信，民主制度的運作要健全，就得先滿足民衆「知」的權利，而本書正是作者信念的實踐。

狂瀾的十年 一個繁華盛世的 興衰啟示錄

The Roaring Nineties
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Prosperous Decade

目錄

導讀	「選擇」決定成敗——讀《狂瀾的十年》	高希均	001
自序			009
謝辭			025
第一章	景氣的榮枯與衰 毀滅的禍種		038
第二章	削減預算赤字 苛請工匠，還是幸運的錯誤？		063
第三章	萬能聯準會		090
第四章	自由化脫序		120
第五章	創意會計		148
第六章	銀行與泡沫		173
第七章	減稅 火上加油		204
第八章	冒險過日子		213
第九章	全球化		235
第十章	細說安隆		276
第十一章	破曉迷思		303
第十二章	邁向新民主理想主義		316
跋	深入經濟管理失當的問題		355

譯者簡介

賀思賢

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曾擔任國內主要財經媒體資深編譯多年，並曾編譯多本金融專書。最近譯作包括《應變》、《杜拉克思想精粹》等。

張元馨

資深譯者。譯作曾獲經濟部中小企業獎金肯定。

導讀

「選擇」決定成敗

——讀《狂飆的十年》

高希均（美國賓州東卡爾大學經濟教授）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

教授的這本《狂飆的十年》，是以冷靜的筆調及熱烈的自信引證美國經濟政策、企業運作及全球化經驗，來討論公共政策的選擇。對的政策會帶來繁榮；錯誤的政策選擇，會帶來慘痛。

如果「性格」決定命運；那麼「選擇」更決定成敗。

當讀者掌握了作者的討論，是放在「選擇」（choice）架構中時，就會引起更多的共鳴，擁有更大的視野：不論是政府、企業或個人都需要在各種環境中，做正確與聰敏的選擇。

事實上，不論是宗教、哲學、科學，都是在提供思考的方向與尋找真理的選擇。經濟學做為社會科學的主流，當然也是在提供決策者（從國家大計到個人理財）做明智的決定。

作者的思想背景與價值觀

讓我先說明史迪格里茲教授（下文簡稱史教授）的背景及他的價值觀。他成長於美國印地安那州，十四歲時就立志要做教授，並且前往參與公共事務。在著名的人文思想機構的反叛、斯特朗學院（Antiser College）主修經濟時，更確定了他對經濟

失業、歧視、貧富不均、環保等議題的關心，後於1967年在MIT取得博士學位，先後任教於耶魯、普林斯頓、史丹佛等大學，現為哥倫比亞大學講座教授。

他追述一九六〇年代進入經濟學界：「當時的我想改變世界，但沒有把握該怎麼做；身為學者，我得多了解這個世界。」

這位諾貝爾得主具有深厚的理論與實務經驗。在柯林頓總統任內在五年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的委員及主席（1993-97）；接著又擔任了三年多世界銀行資深副總裁與首席經濟學家（1997-2000）。

在最重要的經濟理念上：政府的角色是微小而積極，抑是要大而積極，另一位諾貝爾獎得主傅利曼屬於前者，史教授則是後者。在美國，前者泛稱為保守派，後者則稱為自由派。

讓讀者再重溫一次我曾針對市場經濟運作完滿下的描述：

「在傅利曼教授的邏輯世界中，政府的管制要減少到最低，人民請因受教權到最高；市場上充滿了競爭，當然沒有聯合壟斷；消費者有足夠的情報，當然可以做明智的選擇；賺錢的廠商應任其擴展，虧本的事業應任其倒閉；政府預算不宜有赤字；貨幣供給量應當受到穩定的控制；窮人申請救濟時就給他們現金，富人創造財富時就給他們減稅；人民的資金與貨物可以在國內外自由地流動，沒有本國的干預，也沒有他國的限制；在公開競爭下，效率比公平更重要；在現代社會裡，自由比平等更可靠；人為了滿足自己；結果反而是利人；人如果一心為了利他，結果反而是兩頭落空。」

「傅利曼教授的邏輯來自他對市場經濟與混合型經濟制

度的信心。他心目中的這個理想世界變成了人間的天堂，又有誰會不嚮往？可惜的是，到天堂之路何其坎坷而遙遠。在現實世界中，我們所觀察到的幾乎與他所嚮往的，仍有那麼大的落差。」

史教授在書中就是持市場不完美的論點。他寫著：

「有人戲說政府扮演的角色愈小愈好；有人認為，政府應該扮演重要但有限的角色，不僅要導正市場的失敗和限制，也要努力追求更大的社會正義，兩派一直存有理念之爭。我屬於後者陣營，而本書就在於解釋，我為什麼認為，市場雖是美國經濟繁榮的核心，本身卻經常運作不良，無法解決所有問題，以及為什麼政府一直是市場重要的夥伴。」

然後，本書作者提出了「對的小優點」(right balance)的架構。在經濟政策領域中，很多爭論就是因為難以找到「好的平衡」。例如：

- 充分就業 vs. 通貨膨脹
- 減稅 vs. 財政赤字
- 增稅 vs. 企業投資
- 最低工資 vs. 就業機會
- 保護主義 vs. 消費者權益
- 開放外勞 vs. 本國就業
- 環保 vs. 企業成本
- 增加效率 vs. 增加公平

這八個例子無一不牽涉到相互抵牾 (trade-off) 的選擇。在美國，共和黨的政策偏向減稅、控制財政赤字、物價穩定、增加效率；民主黨則傾向增加政府支出、照顧弱勢團體、創造就業及增加公平。

從批判、反省到建構「新民主理想主義」

在「狂瀾的十年」中，因為作者擔任過柯林頓總統首席經濟顧問，他儘管可以分享柯林頓任內卓越的經濟成就，但是坦認民主黨政府在法令上的過度鬆綁、金融市場上的脫序，與企業家的貪婪，造成了空前的廣告，及社會的損失。

他最嚴厲的批評是保留給柯林頓之前的舊根與老布希二位總統，以及接任的小布希。他認為這些共和黨人：只想以減稅奉順富人；又以減少政府支出忽視窮人；尤其對小布希執政以來的事邊主義反個人趨勢，提出了嚴厲的批判。

我自己已在2001年紐約911恐怖事件之前一個月就寫過：

「二十一世紀初，美國是當前世界舞台上獨一無二的超級強國。如果它『富』而不驕、『強』而不霸、『廉』而不奢、『樂』而不淫，不僅是美國之福，也是世界各國之福。」

可惜，小布希沒有自負之明。

如果要為全球的一些反美情緒尋找藉口，那麼美國政府（不是美國人民）在某些時空所做的決定，反映出「唯我獨尊」、「唯我獨尊」的霸氣，足會引起反感的。史教授在書中也不斷對美國政府的這種行為表示失望，並且要求自我反省。

美國 911 恐怖事件的影響，十歲大的「新經濟」也面臨到不同的嚴峻考驗。

在一九九〇年代，美國社會出現了兩個相互關連、甚至互為消長的矛盾：「新經濟」（New Economy）與「知識經濟」（Knowledge-based Economy）。它是泛指一種「新」經濟現象：物質穩定，失業率下降，經濟成長上升，嚴重的財政赤字逐漸消失，甚至產生剩餘。這就是書中所敘述的柯林頓執政八年下的「狂風的十年」。

需要指出的是：新經濟持續成長的根源，不再是傳統的生產因素，如勞力、土地、自然資源、資本；而是來自幾個關鍵因素的激盪：創新的叢生、新科技的運用、新商業模式的實驗、新運作工具的擴大。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格林斯潘做了一個生動的註釋：「資訊科技（IT）拉高了一個經濟長期成長的上限。」

當大眾正沈醉於一九九〇年代新經濟帶來的空前繁榮時，突然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美國股市慘跌，尤其科技股的泡沫化波及全球。美國科技股（那斯達克）從 2000 年 3 月到 2001 年 8 月，股票市值跌幅超過三分之二，四兆美元的「紙上財富」煙消雲散，科技「新貴」若未在適當時間處理股票，就可能變成了科技「乞丐」。

故本書作者日擊到這種華麗的起伏與一些大企業家之缺少倫理與社會責任，使得這位充滿理想色彩的諾貝爾獎得主大聲疾呼，美國需要建立新願景與新價值。這些「新民主理想主義」（Democratic Idealism）就是圍繞著社會正義、機會平等、集體行動、群我關係、以及永續發展等方面。

一起走過從前

我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河城校區）經濟系執教了三十餘年，我教過最精采的一門課就是「美國經濟政策」，尤其與美國同學談到保護主義、美元強勢、落後地區發展等題目時，總有熱烈的辯論。因此對書中出現的主題特別感到親切：只是我個人的價值觀念較接近傳利義的市場學派；尤其看到政府的「廉」與「能」兩者都缺乏時，更不敢把信心放在政府的決策上。

表一顯示到美國以後，自己所觀察過的九位美國總統。純從經濟成就方面來評比，我滿意的只有一位：柯林頓。卸任以後的總統，我認為卡特做了很好的示範。

表一：歷任美國總統 (35 屆—43 屆)
重大經濟政策 (1961—2005)

屆數	姓名	任期	重大經濟政策
35	John F. Kennedy	Jan 20, 1961—Nov 22, 1963	提出「新經濟」及預算
36	Lyndon B. Johnson	Nov 22, 1963—Jan 20, 1969	提出「大社會」，推動黑人及弱勢
37	Richard M. Nixon	Jan 20, 1969—Jan 20, 1973	出現「帶薪性停滯上升」，實施「價格與工資管制」
38	Gerald R. Ford	Aug 9, 1974—Jan 20, 1977	實施通貨膨脹
39	Jerry Carter	Jan 20, 1977—Jan 20, 1981	初遇里根黨同升，上升，造成指數劇升
40	Ronald Reagan	Jan 20, 1981—Jan 20, 1989	推動里根學堂或新政策，同時實施新黨綱
41	George H. W. Bush	Jan 20, 1989—Jan 20, 1993	減少行政支出並日減稅
42	Bill Clinton	Jan 20, 1993—Jan 20, 2001	平衡財政赤字，增加，失業率下降
43	George W. Bush	Jan 20, 2001—	大量政府，發動伊拉克戰爭

美國：離天堂最近、離地獄最遠！

不久前，我對美國社會有過這樣的描述：

人人有成功的機會，人人有失敗的自由，這就是公平的美國。

大家向前看，大家向後看，這就是公平的美國。

有更多的百萬富翁，有更多的貧窮家庭，這就是殘缺的美國。

處處有大愛，時時有掙扎，這就是迷惑的美國。

右手拿木棒，左手拿胡蘿蔔，這就是官方的美國。

四十年來，自己一直住在中西部的大平原上以及大學城中。那裡浮機、自由、開放、歧視少、犯罪少、失業率低。對我來說，美國的可愛，不在它既有的財富，而在它未來的機會；美國的可愛，不僅是社會富裕孕育出來的生活情趣，更在於科技突破帶來的顛覆；美國之最令人嚮往，就在於它就是一個可以自由自在、自我發揮的自由天地！

接近2005年的歲末，美國經歷了911恐怖襲擊、伊拉克戰爭，布希總統的聲望跌入谷底之際，做為一個做客的知識份子，我願意持平地說：與其他國家相比，美國還是離天堂最近、離地獄最遠的地方！

願景

從這本《狂瀾的十年》以及其他著述中，我們深窺史教授的學問、經驗與理想主義所吸引。他真是一位同時擁有「溫暖

的心」與「冷靜的腦」的學者。除了著述，他也熱心地參與及提倡公共政策的辯論。

作者在「跋」中指出：「向政治人物學習經濟課題，我們是陷自己於危險。」但是從這個經濟學者身上學經濟教訓，應當一無風險。

在批評美國政府在「全球化」方面言行不一時，他指出：「我們其實還有另一個願景可以選擇：這個願景的基礎是全球社會正義，以及政府與市場的均衡角色。」這正是「狂瀾的十年」留給我們今天最大的教訓，以及最應該努力的方向。

（2005年11月，台北）

自序

就在十年前，筆者離開史丹福大學，結束教授的生活，前往華府，先後擔任柯林頓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的成員及主席。過去二十五年來，筆者一直鑽研於經濟學理論和經濟政策。我想當個觀察者，見證實際的運作發展。但是，我不想只是作壁上觀。我在一九九〇年代進入經濟學界，那個年代充斥著民權及反戰運動。我白付，當時的我想改變世界，但沒有把握該怎麼做；身為學者，我得多了解這個世界。

重新解讀九〇年代的諸多吊詭

我也不太清楚該了解到什麼程度。我在柯林頓政府第一期服務完後，又到世界銀行（World Bank）擔任資深副總裁及首席經濟學家三年，等到我離開華府，許多事情已經今非昔比。那是一段動盪的歲月，狂飆的九九〇年代：一個充滿起大事件膽案和高度繁榮成長的年代。當時種種多有公諸於世。但我認為，還有許多故事不是眾所周知，也不是知之甚詳，而此埋下撰寫本書的伏筆。例如，一九九一年經濟衰退後的復甦，似乎就和對世傳的經濟學理論大相逕庭。柯林頓政府內部部分人士主張，削減赤字（總統政府支出和稅收的差距）是經濟復甦的驱动力，這就屬於主流說法；但是，經濟學教科書卻認為，削減赤字適足以導致經濟衰退惡化。再舉一例，筆者多次參與有關會計準則及管制鬆綁的論戰，我認為，我們犯了

自由化過當的毛病，尤其是在銀行自由化方面；我們也錯失了改善企業會計的良機。一九九〇年代更代表著所謂「新經濟」（New Economy）崛起的年代，生產力比前二十年成長兩、三倍。創新經濟學一直是著者專長的學術研究領域之一。一九七〇年代及一九八〇年代的生產力大幅衰退，一九九〇年代的生產力激增，我認為，進一步掌握其中的原因是很重要的。

但是，在我提筆寫書之前，事實已證明一切。經濟再度陷入衰退，顯示衰退並未成為歷史名詞。企業醜聞和美國資本主義的首腦拉下馬來；美國部分大企業的執行長們似乎犧牲股東和員工的利益營私自肥。運輸及通制成本下降，世界各國的整合更加密切，而帶來全球化；人為障礙的消滅，不久前才被喻為揭開新世界的序幕。但是，這兩股潮流卻受到大部分世人的偏頗眼光以待。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一九九九年華盛頓州西雅圖市召開會議，也就是所謂的西雅圖回合，原本寄望在美國的領導下，世界能夠展開新一回合的開放風潮，這將是柯林頓在 globalization 進程上一個永恆的貢獻。然而，會議卻以暴動收場，環保人士、保護主義份子、擔心全球化會不時衝擊窮人的人士、以及疑慮全球經濟體制缺乏民主本質的人士，一起攜手走上街頭。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則凸顯了全球化更為黑暗的一面；恐怖主義也能輕易跨越國界，恐怖主義的根源複雜難解，但是，全球大部分地區陷入絕望，失業率居高不下，這些顯然是恐怖主義滋生的絕佳沃土。

創新在九〇年代的聲音旋即而至，甚至在柯林頓政府卸任前就已出現。這些聲音讓我們重新看待那個年代所發生的種種，而重新解讀那個年代，也因此變得更加迫切。

找到政府與市場的平衡點

結果，這項著作計畫與另一項計畫不謀而合。我長久以來一直關心政府在我們社會、尤其是經濟中的適當角色。我前往華府擔任公職的前幾年，曾經寫過一本名為《國家的經濟角色》（*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State*）的書，試圖依據政府及市場的優缺點，闡明兩者的適當角色。我也試圖列出若干原則，界定政府哪些當為及哪些不當為。在貼身觀察政府運作八年後，我希望重新探討這個主題。研究一九九〇年代正是一個機會：當根及柴契爾主政時，政府和市場的角色失調；何林頓政府的成功，部分固然可以歸因於我們在平衡政府及市場角色上略有所成，但是我們的平衡點仍然不對，而且是直到一九九〇年代告終時，才發現這個錯誤。

有人鼓吹政府扮演的角色愈小愈好；有人認為，政府應該扮演重要但有限的角色，不僅要導正市場的失敗和限制，也要努力追求更大的社會正義。兩派一直存有理念之爭。我屬於後者陣營，而本書就在於解釋，我為什麼認為，市場雖是美國經濟繁榮的核心，本身卻經常運作不良，無法解決所有問題，以及為什麼政府一直是市場重要的夥伴。

本書不只是重述九〇年代的經濟史，它既在描寫過往，也要敘述未來，勾勒美國及其他已開發國家的自我定位及未來方向。從教會、企業執行長、司法部門到會計師，我們社會許多核心機構都已經喪失信譽，有些甚至難以同復。本書只探討經濟組織，但筆者不禁想到，這些組織的作為不但反映了組織外部的環境，更對外界產生深遠的影響。

無論是左派或右派，都已經迷失方向。自由放任經濟學的

假設基礎在於，認為市場本身會帶來有效率且公平的结果，如今這個基礎已經消散。九一一事件之後，世界陷入危機，我們才恍然大悟，大家必須共同採取行動。企業關閉震撼企業，歐洲所受的衝擊相對較小，但是連保守派都因此警覺到，政府有其功能。蘇聯解體後，冷戰隨之結束，也導向左派的經濟支柱；即使是過去社會主義勢力強大的國家，對老派社會主義的熱情也逐漸消褪。

今天的挑戰在於找到對的平衡點，在國家與市場之間求取平衡，也在地方、國家及全球等不同層次的集體行動中求取平衡，政府機構與非政府組織的行動間更要求取平衡。隨著經濟情勢變遷，我們也付重新訂定平衡點。政府的職能必須去舊納新。我們已經進入全球化紀元，國家與個人的連結也比以往更加緊密。但是，全球化本身代表我們得調緩平衡點：國際社會需要更多的集體行動，而在全球領域，我們也應該促進民主和社會正義的議題。

過去十五年間，各經濟體及各國社會經歷劇烈變動，對國家與市場之間的平衡，構成高度緊繃；對此，我們卻未能適當因應。過去幾年前年發生的問題，部分正是反映這個過失。本書希望提出一個架構，以幫助我們找回這個平衡點。

呼風喚雨的金融業

本書還有一個主題。一九九〇年代是金融業當道的時代。華爾街的金城下女們靠著聯合交易、為新上市公司籌資，獲利達數百億美元、甚至數十億美元。最頂尖、最聰明的美國年輕人都想加入這場驚心動魄的賽局。美國存本市場經濟的流通；待遇反映能力。薪資高的人代表對社會貢獻較大。難怪年輕人

予相起這波金融熱潮，造福自己就是造福社會。

政府決策國對金融觀點也是抱持一樣的敬意。由金融界精英組成的中央銀行，可以獨立制定貨幣政策，在他們穩健的雙手操作下，能夠確保沒有通貨膨脹的穩定成長。知名記者伍德德（Bob Woodward）一九九四年的《白宮潛沉錄》（*The Agenda*，香港）一書，生動地描繪了削減赤字如何一躍成為克林頓總統的優先課題。柯林頓之所以能當選，不是靠削減赤字政見；但是有人說服了他，如果不削減赤字，就會遭到金融市場的懲罰，而沒有金融圈的支持，他也不可能實現其他政見。於是，萬丹莫如削減赤字緊急，除了削減赤字，他把其他議題都擱在一邊，而其中大部分後來也未獲實現。

我應該說清楚：我相信金融很重要。事實上，我本身在資訊經濟學的研究有助於釐清金融和經濟之間的關係。麻省理工學院的莫效格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及芝加哥大學的米勒教授（Merton Miller）都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他們曾經指出，如果撇開稅務考量，企業籌措資金的各種方式，它們沒有任何差異。本人在不對稱資訊的研究有助於說明財務金融在現代經濟的核心角色；同時也能解釋，未受規範的金融市場為什麼經常出亂子，為什麼需要政府，以及為什麼行利率倒掛的事情未必有利整個國家經濟（而且經常如此）或特定團體。

狂瀾的一九九〇年代是一連串歷史悠久的制衡關係逐漸斷裂的過程，包括華爾街、商界及勢力之間的制衡，傳統產業與新興科技之間的制衡，以及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制衡。從某個角度來說，釐清這層關係的，正是日益興起的金融市場。每個人都臣服於它的判斷標準。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都得接受市場紀律。長久以來的政策選擇觀念：也就是不同的政策會影響不

同的團體，其中必有權衡取捨，而政治便在於提供一個舞台，供各方評估利害得失，以達成決策，都達到解套。

柯林頓執政期間，我們曉得美國金融市場是錯亂的。如果金融市場是在高熱上的雲霄轎車，如果真有一袋錢能夠面面俱到，那麼誰能劃區隔我們和共和黨的人，不過是執政能力高下。由此也衍生出一種精神分裂症。我們相信我們推動的政策與眾不同，我們的政策遠隔窮人和中產階級的程度，遠超過共和黨鼓吹的政策；我們也認為政策必然有所取捨，但是在此同時，創作者多當朝人士似乎認定，債券市場或者更廣泛的金融市場最了解未來的道路。金融市場似乎比了解美國以及金融市場的最佳利益為何。我知此為無稽之談。我相信，如果我們做了一些債券市場或其他金融市場不樂意的事情，而必須付出代價，這個代價可能還是便宜買價（注1）。畢竟，金融市場雖然重要，華爾街卻是不折不扣的特殊利益團體。

「美國典範」，全球借鏡

我撰寫本書時有多重身分。我是美國人，也曾參與過美國內部的政治討論，更深切關心美國未來的發展方向。此外，我也積極參與世界各國類似的討論，以及針對全球化這個當紅議題更廣泛的論證。我相信，包括新氣象性、總體政策的不善、解除舊制脫序演出、以及由此引發的企業醜聞等，美國的這些失敗不是只有美國人關心。本品所鋪陳的事件是全世界都關心的議題，其中不是沒有幾分道理。

全球化之下，世人愈來愈互相依賴。以前有人說，美國打噴嚏，墨西哥就感冒。如今，美國打噴嚏，世界許多國家都會感冒。但是，美國當前的問題絕對不只是感冒而已。要分析

全球當前及先前十年的經濟問題，一定得先從美國論起。

此外，全球化不只是商品、勞務以及資金能夠自由跨越國界流通而已。如上所述，美國在一九九〇年代成為其他各國的典範。外界都睜大眼睛在看，期待美國如何找出政府與市場之間正當的平衡點，以及需要哪些體制及政策，才能讓市場經濟運作完善。美國企業實務為全球各地企業奉行，美國也盡其所能地將它那套會計準則推行全球。有些國家並非自願模仿美國，包括某些認為美國未掌握正確平衡點的國家，但是他們希望自己的國家的經濟也能欣欣向榮，因此被吸引去決策，接納這個典範：至於依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金援的開發中國家，更是被迫遵行這套號稱是「改革歷史」的制度。

難逃此處探討的問題，在全球許多國家屢見不鮮。歐洲企業也爆發醜聞，威達迪（Vivendi）等大企業的執行長紛紛中箭落馬，連荷蘭食品雜貨商家阿霍德（Ahold）這種經營穩健的公司，也烙上不光彩的印記。美國企業高層主管涉及不法情事已經到了俯拾皆是的程度，其他地區企業的高層主管或許沒有那麼惡形惡狀，但醜聞趨勢仍然令人憂心。

這場美式醜聞運行其他歐、澳，演出方式雷同，只是換個舞台。其他國家甚至比美國更容易自服於金融市場及其勢力；金融國際的觀點決定政府政策，甚至主導選舉結果。削減赤字的壓力，加上奮力不懈地打擊近二十年前的通貨膨脹，這些都讓歐洲各國在因應一九九〇年以來的經濟低迷時舉步維艱。本書付梓時，歐洲經濟面臨通貨膨脹及失業日增的隱憂，歐洲先前所採取的政策可能會讓經濟由衰退步入蕭條。日本也深陷停滯型通貨膨脹，甚至更糟。世界正迎面對進入全球化時代後，第一

個全球性經濟下坡。

最根本的問題在於政府角色定位的觀念論戰。有人認為，最理想的政府應該愈少愈好；另一派則相信，為了建立我們心目中理想的社會，政府應該更積極介入。兩派的理念之爭輪番在各國上演，從大西洋兩岸打到太平洋兩岸，開發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都一樣。美國近來的經驗對所有國家都是一大教訓，筆者希望書末幾章提出的課題——以及我所描繪的未來方針，對其他國家和對美國都一樣管用。

經濟學家的第三隻眼

本書不是調查報導。我提及的企業醜聞等問題，其他文獻上更有完整的紀錄（注2）。我的目的在於解讀，在於幫助我們了解事情出了什麼差錯，還有該怎樣解決。身為社會科學家，我不認為牽涉如此之廣的問題純屬意外，只是一些行為偏差人到七老八十所為的結果。我認為其中存有系統缺陷，結果的確找到一大堆。有趣的是，其中有許多問題和我三十年來研究的議題息息相關，這些問題都和資訊不完全、尤其是資訊不對稱相關；換句話說就是，有些人掌握了別人沒有的資訊。這些理論的精進幫助我們解出了什麼差錯，以及其中的原因。這些理論也有助於說明，為什麼在問題浮現的幾年前，我曾在柯林頓政府內部對抗會引發這些問題的政策。十年前，有人提及這些問題爆發的可能性時，大致只是停留在理論層面——如今，證據斑斑可覓。但是在某些角落，仍然有人抗拒改革，也抗拒處理這些問題（注3）。

本書之所以能成，和我的前一本書一樣，都必須深深感謝柯林頓總統。拜他所賜，我不僅有機會服務國家，也得以在著

一樣觀察美國政府的運作。身為一位社會科學家，這是個無異倫比的機會。

我不僅要謝謝何林頓總統，給我這個絕佳的機會，更要謝謝他，對經濟顧問委員會在政府體系所扮演的特殊角色，所表現的尊重。我們有幸沒有任何前人遺留的包袱——除了同為美國人民服務之外，而民衆也不太注意我們的一言一行。政府機構會不斷受到各種利益團體的施壓，對此，我們卻享有它們所沒有的自由。本書主題之一就是，個人行事有各種動機；企業及金融界那些行為不檢的人未必特別貪財，或者比前任貪財，只是能夠激發他們的誘因不同，而他們所作所為，便是對誘因的回應。照我們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所受的訓練來看，我們本就更習於發掘設計不良的誘因，而現在，這成為我們的職責；而且從某種角度來說，我們工作的誘因便在於找出有關誘因的問題，因為這樣才能提升我們的專業地位。同理，我們也有強烈的動機，不屈服於特殊利益團體的壓力，否則我們的學術地位將因而受到貶抑。委員會成員大多來自學界，最後終將回歸學界，對他們來說，在學術圈的地位才是最重要的。

擔任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不僅讓我能夠貼身觀察政府決策，也讓我有個絕無僅有的機會，觀察美國經濟趨勢。我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不僅要監視經濟動態，更要思索可能出錯之處，並且防微杜漸、未雨綢繆。我能夠與華官界數一數二的經濟學家對話，了解他們對當前經濟現象的不同解讀，我也有機會與勞工領袖及企業執行長對話，與創投家及華爾街的金融巨頭談，藉此種種，我可以從外界較少接觸的角度觀察美國經濟。他總統費盡心力，想要掌握經濟變局如何影響美國一般民衆；我在亞特蘭大、波特蘭、斯倫布等地召開區域經濟高峰會議。我

的工作之一就是聽取他們關心的議題，並且說明政府正在做些什麼；這些頻繁的短兵交鋒，讓我得以接觸到華爾街較少遇到的人人物。

從世界看美國

一九九〇年代的一次變動是美國在全球經濟地位的改變。

我因著美國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及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和資深副總裁的職務，能夠從兩個角度的觀點看待這個變局。我曾到狂瀾的一九九〇年代對美國及海外的衝擊。我也看到我們的雙重標準，我們在國內鼓吹的做法與我們在海外推動的做法並不一致。那些基於關心窮人而在國內鼓吹社會正義及民主價值的人，在海外卻經常不太在意這些價值。

上述兩項職務也讓我更多認識美國，並知道其他已開發國家、以及全世界如何看待我們。科學界向來沒有國界之分，也不承認所謂的權威。我的學生和同事來自全球各地，事實上，筆者四分之一的工作生涯是在海外渡過的。扎實的入派讓我進入一個一般公職人員不得其門而入的領域。我所見所感令我痛心：連那些在美國接受教育、熱愛美國及美國人的國際人士，對美國政府所作所為都感到失望。總之，美國政府的作爲竟然和美國人吸食的價值背道而馳。接下來的章節中，我會證明這些觀點所言不虛，也會試圖解釋這些現象形成的原因；其次，我也會說明，冷戰結束後，美國在全球經濟所扮演的角色並不符合美國的最期利益。

和《全球化：承諾與失落》（*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大港）一樣，本書並不呈現持一種冷靜的眼光，看待一九九〇年代以來的點點滴滴。以我參與的事件之

多，我豈能排除情感因素，而無動於衷？但是，我們盡量求其精確，根據我對經濟及政治進程的認識，整理相關事件，並解讀事件的意義以及對未來的預示。多年來，筆者對民主制度的信仰日益堅定；而另一方面，我也愈來愈堅信，民主制度若能運作自如，就必須要公民了解所屬社會而對的根本問題，以及政府的運作方式。對大部分人來說，最重要的問題莫過於美國經濟，還有市場與政府間的關係等相關問題。

美國經驗的普世教訓

筆者是一名教師，過去二十五年間，大部分的時間都投入教學：每位教師都清楚，他在教授每堂課時，都會簡化教材，而這是一項無選擇的做法。我儘量做到不過度簡化。我在敘述過去十年間的事件時，這些簡略的闡述所根據的，卻是一些頗為複雜的觀念，而筆者曾在若干著作及數千篇論文中詳細介紹這些觀念。我認定，化繁為簡地說明一些複雜的觀念，要比簡單介紹一些過度簡化的觀念更有說服力，尤其是過度簡化的自由市場理念。身為教師，我並非只是為了趣味才敘述一九九〇年代的點點滴滴，這些事件對身處此境的我們當然就有吸引力，但是我講述這些事件是因為想提出其中所蘊含的普世教訓。

這些教訓對美國固然重要，對世界其他各地也同等重要。美國是全球最強大、最成功的經濟體，受到各國效仿。美國身為全球最強大的國家，關於政府在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它積極推銷它的特定理念，尤其是透過諸如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及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組織推行該理念。不過後半部的核心主題之一就是說明，美國在海外推銷的理念，明顯與美國國內的作為有別。美國人及其他國家如何解讀美國的成（敗），深

切影響到其他国家在政策、計畫及體制的選擇。這是為什麼學到正確的教訓極其重要的原因。

評論柯林頓政府

本書讀者看到我對柯林頓政府的批評，可能會有錯誤的結論，正如我發表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 上一篇同名文章的讀者一樣。如果我給柯林頓政府打分數時顯得過於嚴厲，部分原因在於，我們在一九九三年初擔任公職時期太過高，而後來失望也深。但筆者在此必須澄清的是，我的考評固然嚴格，但最終還是依照相對標準評分。對照柯林頓的前後任政府，尤其是後任的表現，柯林頓政府的分數還稱體面。但是，這個問題不單是分數問題，而是要了解哪裡出了空錯，哪裡做對了，以及原因為何；最重要的是，知道如何打造一個經濟體政更妥善的未來。

柯林頓總統及其行政團隊的成就令我極為自豪。誠然，我們可能可以做得更好，尤其是在重塑後冷戰世界的樣貌，以及如何讓全球化不僅有利於美國，也有利於全球。的確，如果我們不一味追求管制鬆綁，美國現在的狀況或許會更好。但是，我們坦然承認前人留下的包袱——龐大的赤字、日益嚴重的貧富差距、尚未完全脫離衰退的經濟等，並大步向前邁進：我們消除了赤字、經濟也確實強勁復甦。我們降低了貧窮，食品不均已停止惡化，而諸如「龍頭崩潰」(Head Start，譯注：為弱勢兒童所設立的學前計畫)等計畫的擴張，也為未來提供更多進步的空間。當時的政治環境下，我們很難、甚至不可能做到更多。如果有人懷疑筆者的立場，可以先翻到書末的跋，文中對照了柯林頓執政期間及後任政府的事實，認為政治無關緊

要或政治人物都是一丘之貉的人，過去兩年當中，應當都有幾根棒槌的感覺。

或許我對柯林頓政府最感自豪的是，幾乎所有成員都相信「也願意委身於民主價值及社會正義。能夠聚集如此一群才智及決心果斷的人，這樣的因緣際會，史上少見。當時有一小撮人會偶因面子因素，而干擾到決心；但是能夠披荆斬棘、站上高位的人，自尊心本來就都很強。曾在前幾任政府任職的朋友便告誡我，要有防人之心，否則很容易被人陷害。在柯林頓政府任職，激烈的爭執雖是家常便飯，但彼此陷害卻少之又少。柯林頓總統訂下互相尊重的基調。民主制度不只是定期選舉；民主制度應當確保人人能夠暢所欲言，而且有一套思辨的過程。每位進入政府服務的公職人員，都各自帶有其特定觀點，但是基於個人經驗，這些觀點都有其同樣。我們付反覆討論、檢討，從清晨一直到深夜。

期許與盼望

我撰寫本書是因為我當初參與的論戰日後一定會再起波瀾。在民主體制下，這些議題永遠無法有定論。如果我們犯了錯，還是能事後矯正。但前提是，我們要了解為什麼事情的發展與預期不同，了解我們哪裡出了差錯。本書是我的陳述。對於未來與我們理念相通的政府，我希望本書對他們在思辨時有所助益。

我來自學術界，也已回到學術界。我成長於印地安納州蓋瑞鎮（Gary），這個位於密西根湖南岸的鋼鐵城鎮。我十四歲時，立志長大後要成為一位教授，並從事公共服務。幾年後，我就讀安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時，愛上了經濟學，未

來的志而自此成形。我週了解貧窮、失業，以及我在成長過程中所見到各式各種破損的成因，我希望能在解決這些問題上有一番作為。或許我對這些漸進深遠的問題已小有貢獻，但是這個重擔勢必交棒給下一代。我的學生具有的理想性格，他們為理想投入的精力以及委身的承諾，讓我心生盼望。

注1：對金融市場的建告不僅表現在縮減赤字上。例如，在貿易政策方面，我們也擔心匯率的變化。縱使在考慮匯率時，金鎊觀點也具主導地位。匯率降低（美元貶值）意味著，美國廠商能增加輸出，來自外國廠商的競爭也較少，同時美國也能加速成長，創造或至少保住就業機會。然而，對押注「強勢美元」的華爾街投機客來說，匯率降低意味著損失；此外，由於進口貨品更貴，通膨也可能略為提高。任何政策必然涉及取舍，然而政策辯論在金融觀點的主導下，只著眼於負面效應。有一次，底特律擔心美元升值會造成汽車業的外銷困境，也讓美國車與進口日本車難以競爭，記者要求財政部官員對此回應，那位官員甚至辯稱，強勢美元其實會促使美國廠商提高競爭力與銷售力。要是他所言不虛，需求曲線中，價格與數量的反比例關係就要改寫了。

注2：讀者若需要更詳盡的說明，請參考 Arthur Levitt, with Paula Dwyer, *Take On the Street: What Wall Street and Corporate America Don't Want You to Know: What You Can Do to Fight Back*（《掀斗至上》，先施）。

本書第十章注釋1列出我未採採安摩諾蘭的書：Arianna

Huffington 在她所著的 *Pigs at the Trough: How Corporate Greed and Political Corruption Are Undermining America* (New York: Crown, 2003) 一書中，便毫不留情地對美國企業冷嘲熱諷。甚至金融商業媒體也加入攻擊之列，例如 Jerry Useem, "Have They No Shame?", *Fortune*, April 14, 2003, pp.56-64；以及 Janice Revell, "CEO Pensions: The Latest Way to Hide Millions," *Fortune*, April 14, 2003, pp.68。

注 3：我在撰寫本書時，有幸得到許多前柯林頓政府官員記述他們自身經驗的書籍，以及一些一流的新聞報導著作。這些資料讓我將我自己對事件的記憶、解讀，與其他參與者的相對照。儘管各述大都相符，但是其中仍然有些許歧異，尤其是在經濟上更是如此，這點也并不令人意外。

我要特別一提的是，經濟顧問委員會同事布萊德 (Alan Blinder) 以及在我之後繼任主席的葉倫 (Janet Yellen) 合著的 *The Fabulous Decade* (New York: Century Foundation Press, 2001)，該書側重以古典手法，解讀經濟赤字在復甦時期所扮演的角色。Jeffrey A. Frankel 和 Peter R. Orszag, eds., *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in the 1990s* (Cambridge, MA: MIT, 2002)，該書則屬學術研究。在眾多回憶錄中，下列幾本是我認為幫助最大均：Arthur Levitt, with Paula Dwyer, *Take On the Street: What Wall Street and Corporate America Don't Want You to Know. What You Can Do to Fight Back*；Reed Hundt (前聯邦通訊委員會主席)，*You Say You Want a Revolution: A Story of Information Age Pol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Robert Reich, *Locked in the Cabinet* (New York: Knopf, 1997)；以及 George Stephanopoulos, *All Too*

Human: A Political Educa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99)。
而柯林頓執政時期的領導著作中，伍華德的《白宮浮沉錄》詳盡探討了預算戰，而他所著的 *Maestro: Greenspan's Fed and the American Boo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大師的年代》，藍綠》一書，則對美國的發展有截然不同的解讀。而 Elizabeth Drew 有兩本書全盤探討了柯林頓主政頭幾年的狀況：《Showdown: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Gingrich Congress and the Clinton White House》(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On the Edge》(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5)。其他參考書籍還包括：Joel Klein et al., *A Day with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Leading Business Issue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Legal Center for the Public Interest, 1997)；Steven E. Schier, ed., *The Postmodern Presidency: Bill Clinton's Legacy in U.S. Politics* (Pittsburgh: Pitts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謝辭

在寫像這樣的一本書時，你會欠下一身人情債。我要感謝我的學術同僚，幫我瞭解本書討論的問題所涵蓋的經濟學基礎，還有那些在華府和世界各地與我共事、協助我透過不同觀點瞭解美國經驗的人，以及那些曾經幫忙寫作和編輯的人。本書謝辭若是遺漏了任何人，我要向他們致歉。而以下所提及的人，當中有很多或許並不贊同我對事件的解讀，有些還反對我歸納的政策結論，而且不是每個人都贊同我在本書最後幾章所提出的觀點。但是，無論他們知不知情，他們每個人都對本書所闡述的觀點有所貢獻。

我過去四十年致力於研究資訊經濟學、公共經濟學、總體經濟學與財務，這些研究影響了我對九〇年代以及接下來幾年事件的觀點。我很幸運，先後在安默斯特學院、麻省理工學院（MIT）、麻州劍橋（Cambridge），受教於一些全球頂尖的老師，其中包括考勒瑞（Arnold Collety，後來成為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尼爾森（Jim Nelson）、里爾斯（Ralph Beals）、山穆森（Paul Samuelson）、梭羅（Robert Solow）、莫狄格利安尼、金德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注1）、卡爾德（Nicholas Kaldor）、羅賓森（Jean Robinson）與漢恩（Frank Hahn）。就許多方面而言，我在MIT的老師、史丹佛大學的同事、艾洛（Kenneth Arrow）打開了我在資訊經濟學領域的視野。我的第一篇論文是和MIT的同學亞科洛夫（George Akerlof）合寫的，我稍後來在二〇〇一年分享諾貝爾獎。將近四十年前，我們便討

論到市場的限制，還有不完全資訊的問題，其中有些對話，我到現在都還記得。此外，七〇年代，我剛從研究所畢業，在史丹佛大學擔任教授時，便有幸與後來共享諾貝爾獎錢的史賓斯（A. Michael Spence）共事。談到風險、資訊和決策、企業治理及財務、首次公開發行（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IPO），還有經濟整體表現與企業內部營運間的關連等問題，都讓我埋頭研究，津津有味；羅斯柴德（Michael Rothschild）、戴蒙（Peter Diamond）、阿諾特（Richard Arnott）、奈爾巴夫（Barry Nalebuff）、曼羅伊曼（Sanford Grossman）、沙皮羅（Carl Shapiro）、蓋爾（Ian Gale）、戴克（Alex Dyck）、海爾曼（Thomas Helmann）、尼瑞（Peter Neary）、沙洛普（Steve Salop）、莫達克（Kevin Mudeoch）、威斯（Andrew Weiss）、葛林沃德（Bruce Greenwald）等人，都是曾與我研習研究的戰友。儘管葛林沃德未必同意我在這兒所為的一切，他卻別具洞見，協助我洞悉企業行為的個體經濟學，與經濟總體績效間的關連，並幫助我瞭解柯林斯政府一九九三年的復甦歸功於縮減赤字這個說法中，什麼是錯的，什麼是對的。

此外，我也該感謝波斯金（Michael Boskin）、穆林斯（David Mullins）和伍夫森（Mark Wolfson）三位。波斯金是我在史丹佛大學的同事，曾經擔任小布希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穆林斯原本在哈佛大學商學院任教，後來獲任命為聯邦準備理事會（Federal Reserve Board）副主席；伍夫森是史丹佛大學會計系教授，在從資訊經濟學觀點反省會計制度的過程中，他扮演了重要角色（注2）。

哥倫比亞大學提供了一個絕佳的環境，讓我繼續從事研究。我要感謝商學院所長費德保（Myer Feldberg）、國際與公共